

冯契与

马克思主义哲学

王向清 著

中国化

湘潭大学出版社

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王向清 著

湘潭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王向清著. -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1128-034-0

I. 冯… II. 王… III. ①冯契 (1915-1995) - 哲学思想 - 研究②马克思主义哲学 - 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B26
B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1471 号

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王向清 著

责任编辑: 黎 毅

设计: 黄 敏

出版发行: 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 0732-8298966 邮编: 411105

网 址: <http://web.xtu.edu.cn:8080/pub/>

印 刷: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邵阳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8-034-0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本书由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04A062)

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资 助

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是我国近年来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工人阶级的人类先进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历史观与价值论的统一,乃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因而能否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是一个直接关系到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事业成败得失的关键问题。而且,这一问题也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会通、相融贯,以实现二者的真正合流,使中国哲学真正成为世界哲学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问题。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近30年来,我国的许多理论工作者,包括一大批专业哲学工作者和哲学家,曾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探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在这些有重要成就的专业哲学家当中,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冯契教授是较突出的一位。因此,王向清同志承担的湖南省教育厅“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课题及其作为这一课题结题成果的同名书稿,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热点问题的直接回应。它从分析冯契哲学贡献的个案入手,回答了诸如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类的理论问题。而且,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在有关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上具有一定范例意义的学术著作。

粗读书稿,我以为本书有以下几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1. 从学术层面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条标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作了科学的阐释和明确的界定。我认为这种阐释和界定不仅是准确的,也是富有新意的。

2. 全面而有重点地揭示了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作的特殊贡献的几个方面:在广义认识论基础上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智慧”说哲学体系;在说明认识的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的基础上,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体系;提出了化理论为德性,通过认识的辩证法贯彻于价值领域,在化理想为现实以创造真善美的活动中,培养自由人格的德性而建构了平

民化的自由人格学说;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读,诠释了中国传统哲学。在这方面,作者特别强调了冯契建构的“智慧”说体系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独特创造”,我以为这一评价是公允的、实事求是的。冯契的“智慧”学说是以求“穷通”(穷究天人之际,会通百家之说)为特征的,“它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总见解,即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以及对这种认识的认识(此即智慧学说)”。而由于“性”与“天道”的问题,实即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或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提出并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大都是以“天人合一”立论的。因此,智慧学说作为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是最富于民族特色的,是民族哲学传统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其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最具中国民族特色智慧的资源和素材,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对之进行解释,即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重要哲学问题中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使之得到了系统整理、解读和提升。这样建构起来的智慧学说,无疑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最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这样的哲学体系自然也就是具有创造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3. 书稿对冯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法方面所作其他贡献的一系列具体论述和分析也是论证充分,详略得宜的,而且也颇多新意。比如书稿对冯契提出的广义认识论的必要性和科学性所作的深入分析;对冯契所倡导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特征及人格学说的时代性和前瞻性所作的分析;对冯契的自由学说的理论意义和时代意义的挖掘,以及对冯契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当理直气壮地提倡个性自由与个性解放的思想所作的肯定性论证和评价;对冯契就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提出的具体分析所作的阐发和论述等,都是很有见地的,富有作者个人的独到见解的。

总之,从课题立项到书稿的写作完成和即将问世,清楚表明作者在系统研究和探索冯契哲学思想的道路上走出了坚实而富有成果的一步。不过,正如方克立教授所曾经提出的,由于冯契教授是一位“学养深厚、知识渊博、兼通古今中西、融贯儒释道,能够自由地出入于形而上学、知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理论的大师级的哲学家……在各个领域都提出许多深刻的,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并且一以贯之的哲学立场,建构一个真、善、美统一的自身圆融的哲学体系的哲学家”(方克立,1995年8月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召开的第九届中国哲学大会上的发言稿),因此,发掘冯契哲学思想宝库中的丰富宝藏,探索冯契在哲学各个领域所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性思想,进一步揭示冯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所作出的重要成就和贡献,这绝非是写一两部书就可能完成的,还需要我们作更大的努力,进行更

系统、更全面、更深入、更持久地研究。这不仅是更加充分地、完整地发掘和总结作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大师之一的冯契的哲学思想的需要,更是有效地促进和推动我国当代哲学健康发展,从而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需要。因此,我热切期望、也有理由确信,书稿作者王向清同志作为一位在冯契哲学思想长期培育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年哲学工作者,一定会在已经所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加责无旁贷地坚持对冯契哲学思想的探索和研究,不断写出更多更好的研究冯契哲学思想的佳作来。

彭漪涟

2008年1月3日

于华东师范大学



CONTENTS

目 录

序	1
引 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回顾	4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层面	4
二、李达、艾思奇、张岱年对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步准备	5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贡献	11
第二章 冯契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独特创造	29
一、“智慧”说哲学体系建构的时代背景	29
二、“智慧”说哲学体系的逻辑结构	31
三、“智慧”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	35
四、“智慧”说对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38
第三章 冯契眼界中人的认识的形成过程	42
一、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实在	42
二、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	50
三、真理的形成过程	68
第四章 冯契对人的本质的新见解	89
一、人的本质是化天性为德性,德性复归天性的辩证统一	89
二、人的本质是理性和非理性的辩证结合	95

三、人的本质是共性与个性的综合	98
四、人的本质理论的思想渊源	102
五、冯契对人的本质的发展的阐释	105
 第五章 冯契的理想人格学说	111
一、冯契理想人格学说构建的理论前提	113
二、冯契理想人格学说的基本内容	121
三、冯契理想人格学说的思想渊源	131
四、冯契理想人格学说的当代性与前瞻性	144
 第六章 冯契视域中的中国传统哲学	152
一、社会实践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源泉	152
二、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立场把握中国传统哲学	154
三、强调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发展	155
四、站在哲学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唯物辩证法阶段回顾中国古代哲学	159
 第七章 冯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解读和阐发	161
一、对毛泽东方法论的阐发	161
二、对毛泽东真理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171
三、对毛泽东自觉能动性思想的发挥与反思	178
 第八章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理论	183
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根据	183
二、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制约因素	184
三、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阶段构成	186
四、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主要成果	191
五、对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一般成果的论述	196
六、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表现	198
七、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缺失	199
 后 记	203

引 言

冯契(1915—1995),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191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35年,冯契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抗战爆发后,曾赴延安,并辗转山西、河北等地,参加抗日工作。1939年前往西南联大复学,1941年毕业。1941年至1944年,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曾从学于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等著名哲学家。离开西南联大后,曾任教于云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政治教育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名誉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第一届、第二届副会长,中国辩证逻辑学会会长。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哲学史和哲学元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哲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和地位。

冯契先生著述丰厚,其论著结集为十卷本的《冯契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6—1998年陆续出版。《冯契文集》包括“智慧”说三篇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三卷;《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卷;《智慧的探索》一卷(改革开放以后的论文汇编);《智慧的探索·补编》(改革开放以前的论文汇编);《哲学讲演录·哲学通信》一卷。

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冯契先生自觉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比较中西,兼容百家,对先秦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作了富有开拓精神和创见的提纲挈领式的勾勒,撰成了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一卷本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种著作,终成一家之言,对建构科学的中国哲学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体系,侧重于揭示中国古代哲学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二是从广义认识论角度论证中国传统哲学蕴涵了丰富的认识论,以回击所谓中国传统哲学“重人生轻自然、长于伦理而忽

视逻辑”的流行之论,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对中国传统认识论和自然观的理解,三是提出并论证中国近代经历了一场哲学革命,力图揭示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型的内在根据。

在哲学元理论方面,冯契先生的主要贡献便是超越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峙,克服人生和科学的脱节,找到了知识转化为智慧的途径,构建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中国气派的“智慧”说哲学体系,实现了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哲学工作者如何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提供了借鉴。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逻辑和历史两方面的必然性。就逻辑的必然性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东西,是以普遍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处于具体时间、空间中的,是特殊的;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时,必须特殊化、具体化。从逻辑层面上看,就是将全称命题特称化或单称化。所谓历史的必然性是指,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主题,不断从西方引进种种理论以指导变革中国社会的实践,从而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从历史观的角度审视,中国人引进的西方理论依次大体包括了变易史观、进化史观、唯物史观。但前两种历史观并没有指导中国人正确解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主题。经历了长期、曲折的探索,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后找到了唯物史观,在它的指导下,中国的民主革命才逐渐走向胜利。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历史选择的结果。

对此,冯契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中国人之所以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用它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之中国人民所掌握;就必须使它取得民族的形式,使它与中国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使它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这种艰苦的过程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哲学为群众所掌握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民众的革命世界观由自在到自为的过程。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是一个在斗争中发展的过程,既要展开对革命阵营内部错误倾向的斗争,又要和国民党内反动派的理论、资产阶级学者唯心论、形而上学的理论作斗争。冯契确信,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论交锋,不断总结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文化领域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逐步地中国化。毛泽东所撰写《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典范,而他撰写《新民主

^① 冯契:《冯契文集》第七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2—483页。

主义论》则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主题作了科学的解答。

以上是革命家、政治领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它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是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冯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有另一个领域,这就是专业哲学家从事哲学元理论的创造,建构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哲学体系。这实质上是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冯契看来,这是一个很重要、但又是一个严重滞后的领域。正是有感于这一领域的滞后,冯契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起,就着手这方面的探索,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建构了“智慧”说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著名学者汤一介教授于2006年5月15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的文章,认为冯契是一位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力图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分析哲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智慧三说》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辩证法、西方的分析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较好地结合起来的尝试;断言只有像冯契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辩证法研究和解释中国哲学问题,才是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由之路;冯契不仅是“照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接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把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哲学问题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者认为该文对冯契先生哲学思想的评价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

当代著名哲学家方克立教授对冯契先生建构的“智慧”说哲学体系给予了高度评价。“冯契先生的智慧学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力图解决知识如何发展成为智慧,如何实现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如何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问题,也就是说,力图克服科学与人生、知识与智慧的脱节,克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不论他是否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努力的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①

可以这样说,冯契的“智慧”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一判断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哪些贡献依然是为学术界忽视的问题。《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书,所要解答的主要问题就是冯契怎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哪些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他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造性工作给哲学工作者提供了哪些借鉴。

① 《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0页。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回顾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层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入中国的时候起,就存在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括了实践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革命家、政治领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解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从而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述成果由于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探索、大众传媒的宣传而广为人知。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是指哲学工作者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以中国传统哲学的积极成果为切入点,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包括内在结构和内容安排、范畴展开和命题阐释。其体系结构、内容安排、范畴展开和命题阐述应具有中国文化特点和中国气派;其次是指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去解读中国传统哲学,使其可能适用现代社会需要的积极成果得到发展。相对而言,哲学界对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要滞后些,具体表现为对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经历了哪些环节,取得了哪些成果等重大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探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阐发、创造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李大钊、陈独秀初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个阶段是瞿秋白全面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个阶段是李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第四个阶段是艾思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五个阶段是张岱年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

初步探索;第六个阶段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阶段;第七个阶段是冯契等当代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阶段。能否说这七个阶段都达到了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水平、都构成了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环节呢?回答是否定的。要考察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发展,除了弄清其含义外,关键的问题是确定判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笔者认为,判别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包括政治、学术和话语方式三方面的标准。政治标准是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即信守唯物辩证法立场,坚持实践观点,富有革命性和批判精神。学术标准是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有理论上的创新,包括新范畴的概括、新命题的展开、新体系的建构。话语方式标准是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与中华民族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相契合,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政治标准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向,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而学术标准强调理论上的创新;话语方式标准则注重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没有理论的创新,没有达到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水准。从发生学的角度着眼,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从李达、艾思奇开始的,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作为职业哲学家,李达、艾思奇分别致力于从整体上系统地、通俗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张岱年则率先探索了如何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他们充当了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先驱;毛泽东的哲学创造则从多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生成;而冯契的“智慧”说所阐发的广义认识则从体系建构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李达、艾思奇、张岱年对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步准备

1. 李达

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通过翻译、讲授、著述的途径实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30年代初起,李达先后在上海、北京的一些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时著名的红色教授之一。在翻译、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

时,李达还从事艰辛的著述,1923年撰写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1929年撰写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1937年出版了《社会学大纲》、《辩证法的唯物论问答》。这些哲学著述体现了当时的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程度,为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了准备。李达对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准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最早以朦胧的形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虽然是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来的,但李达早在1923年5月撰写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一文中就提出了“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的论断。在他看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划在中国如何从事革命运动的方案;但根据马克思1848年对于波兰等国共产党所设制定的计划,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可以制定出一个革命运动的方案。这些看法体现了“按照中国国情”、“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来应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这实质上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这一层面说上,李达以朦胧的形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这为尔后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理论准备,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作了理论准备。

其次,对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了初步尝试。1937年,李达出版了《社会学大纲》一书。《社会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完整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结构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们都没有像黑格尔那样为自己的哲学思想建立一个逻辑范畴体系,他们的哲学思想散见于多篇哲学论著中。20世纪20年代,苏俄哲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为学术界多数人认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30年代以来,苏俄哲学界在批判德波林学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其代表作是西洛可夫等人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人撰写的《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些著作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这些著作反映了当时苏俄学者的基本看法,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两大部分。李达虽然充分借鉴了上述苏俄哲学著作中的成果,但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提出了异见。《社会学大纲》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历史观、自然观和认识论等组成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由“唯物辩证法”、“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社会的经

济结构”、“社会的政治建筑”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等五篇相互联系的内容构成。这与当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两部分的流行见解显然不同,反映了作者对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初步尝试。

《社会学大纲》虽然有自己的体系结构,但其内容基本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介绍,大部分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论述过的,它只不过用独特的体系结构把这些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讲没有多少理论上的创新。当然,这并不否认《社会学大纲》在局部地方有理论上的创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社会学大纲》在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也没有注意将它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传统结合起来,没有体现出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这就是说,李达并没有建构起富有个性特点、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再次,强调实践观点,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重点的转移。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李达率先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并认为“实践的唯物论”规定“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观之唯物论。”他指出:“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正因为劳动是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媒介,所以由于劳动的概念之唯物论的把握,就能理解人类社会所依以树立的物质的基础,理解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因而建立历史观之唯物论的根据。”^①他还断言:“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②上述见解既强调了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又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方法论化的倾向。因为实践与人类的认识、与人类改造世界的方法密不可分。李达对实践的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革命实践的指南。以此为基础,毛泽东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点由本体论转向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因此,李达强调“实践的唯物论”,注重实践对认识过程的决定作用,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之一。但李达在这一方面也只是为毛泽东的哲学创新作了理论上准备,他本人并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点的转向。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李达的哲学研究只是为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了尝试和准备,并没有真正实现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① 《李达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8页。

② 《李达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61页。

2. 艾思奇

艾思奇在传播、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同样为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了准备。

首先,率先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哲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科,但长期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中,让大多数人感到高不可攀,神秘莫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打破了哲学被少数精英所垄断的局面,使普通劳动者有了自己的精神食粮。但哲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现实性,普通劳动者由于科学文化水平低而难以学习和掌握。在艾思奇看来,哲学在本质上属于全民的智慧,而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它来自实践,理应为实践的主体即广大的人民群众掌握,以便成为指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他断言:“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上事实上的问题”,“哲学不能单只是说得好听的东西,还要能够指导我们做事。它的‘重要的问题是在于要改变世界’”。^①

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批判的武器”转变为广大群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而掀起对旧社会的“武器的批判”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亟待解决的重大的时代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做了大胆的探索。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期间,他在上海的《读书生活》杂志上连续发表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论文24篇,后结集为《大众哲学》,于1937年出版。《大众哲学》以生动、深入浅出的语言赢得了无数的读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起码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所理解,并根据它指导自己的实践,才能真正称得上中国化。可以这样讲,通俗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准备。

其次,第一个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面临的问题,李达在20世纪20年代初以朦胧的形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艾思奇则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他在1938年4月撰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有鉴于此,他呼吁:“现在需要来一个

^① 《艾思奇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7页。